

## 科学与人文的碰撞:方东美的近代文化演变观探释

□ 程 思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方东美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所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大哲学家。面对时代文化的剧变,他从整体人类文化之演进与近代中国文化认识之缺失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对于近代以来人文文化的演变及其原因提出了深刻的看法。在人类思想文化普遍受科学发展影响的态势下,方东美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科学与思想文化之关系,指出了人们对科学的盲目迷信以及对哲学的武断认识,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思想的片面性理解与应用,同时对人类未来思想文化的发展及模式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关键词] 文化;方东美;文化演变观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1.007

[中图分类号] G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6)01-0038-05

## 1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在17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发生了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教育的、文化的……其中一些变化之剧烈程度,或许是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未曾发生过的转变。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中,也蕴育出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他们饱学多识,历经时局之变迁,深怀对苦难大众的同情与救民于水火之责任感,在各自的领域内为扭转这一时代之各种不幸而各自做着深刻地反省与努力。方东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德怀(后改为东美),安徽省桐城县(今枞阳县)人。他自幼深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读大学以后,则开始转入西方哲学之研究。1924年,25岁的方东美即已在美国通过博士学位考试,并归国任教。1937年,方东美应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请,以中国的人生哲学为主题,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大中学生先后做了八次讲演,希望以我国传统文化之伟大精神来鼓舞振奋全国之青年,与日寇作生死搏斗,其对民族与文化的热爱之情可见一斑。1948年,方东美赴台并于台大哲学系任教,此后,他把自己

的一生都奉献在哲学研究与教书育人之中,直至1977年离世。

在台湾出版的《方东美全集》中,一共收纳了方东美先生的十部作品,它们分别是:《中国人生哲学》、《科学哲学与人生》、《生生之德》(论文集)、《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国大乘佛学》(上下册)、《华严宗哲学》(上下册)、《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下册)、《坚白精舍诗集》。值得一提的是,在方东美的一生中,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在这套《方东美全集》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他的学生等整理的其晚年上课时的录音笔记。不过,这些讲课记录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他亲自撰写的著作;就中国哲学界而言,这些作品无疑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台湾学者沈青松曾评价说:“现代学人中,真正贯通中西学术的,唯方先生一人。”这句话极尽了对方东美先生的崇敬之情。事实上,这并没有丝毫夸大方东美在近代以来学术上的地位与成就。若以中学而论,方东美自幼为受传统的儒家家庭教育环境而成长,其国学基本功底深厚,文笔更具桐城派之遗风。从其出版之《坚白精舍诗集》来看,他还是一位颇具才情之诗人,兼有“东方诗哲”之美誉。诚然,具备国学功底与文学才情

作者简介:程思(1986—),男,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之学者在近代的历史上亦不乏其人,但是同时具备有深厚的西方文化与哲学认识,并真正有所创见之人,就屈指可数了。而若以西学而论,方东美先生对于西方哲学与思想文化之研究与运用,近代以来勘称首屈一指。他对于外文文献涉猎之深广度与运用自如的把握度着实让人叹为观止;而他本身亲自撰写的英文著作,不仅思想深邃,语言运用亦具备有古典英文之典雅,这甚至让有些英语世界的人都自叹不如。美国著名哲学家 Lewis E. Hahn 曾由衷地赞叹道:“作为一位哲学家,东美先生不愧是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格理想——集‘诗人、先知、与圣贤’三重复合的人格于一身。”<sup>[1]</sup>

由于某些原因,方东美先生的著作在中国大陆普及流传的时间较晚,而学界对于他的学术身份立场之定位(如“新儒家”、“新道家”等)尚有不確定之争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也与其渊博的学识与宽泛的治学领域有关。正如他本人所自描的:“在家庭传统上我是儒家,在兴情契合上我是道家,在宗教启发上我是佛教徒,但就后天训练而言,我是一个西方人。”<sup>[2]</sup>我们且从整体上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方东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哲学家。

## 2

一个时代的变化发展是立体层次性而非单一平面性的。在时空的立体层次中所表现出来的,既有表层现象之变更,亦有深层内因之推动。而若站在思想文化之立场而言,从来都是思想观念引导实际行动,实践行为又反过来验证思想观念。一切现实层面之现象诸如政治、经济、生活形态、规章制度等的变动,若详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说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某种思想文化之转变。而一个时代思想文化之形成与稳定又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融合过程,它的瓦解与转变虽然受诸多现实因素之影响,但较之现实层面的变化却来的深沉而缓慢。不过,思想文化上的剧变之势一旦形成,它所展现出的对各类实际现象层面上的震荡,则是显得“威力无比”了。

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疑是正处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剧变的关口。从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历代以来几乎自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不仅一切人理建构是优于一切,而且实际的物质生活之所需也无待外求。”<sup>[3]</sup>然而,封建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融合稳定中也逐渐夹杂与沉积了越来越多的腐朽与糟粕,加之后人对前人的种种误解与错用,导致了越

来越多的文化负担与“毒瘤”,因此而累积成为文化变动之内因。与此同时,西方科技文明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武力侵略,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打开国门,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中西文化之种种差异。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古、今、中、西之思想文化交杂而来,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手忙脚乱,一时无法合理地抉择。文化思想上的震动与混乱,也直接导致在短短的百年之内,政治制度、生活形态、教育方式等等不断地变化动荡与调整,使人仿佛是生活在变乱的夹缝之中。然而,若以整个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之演变来看,以上所述的中国近代文化之变动也只是人类思想文化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属于人类整体文化变动之一部分。如果要真正认清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种种演变,则首先必须要向上一层了解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至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上的种种演化过程。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方东美在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人类文化史来看,无论是希腊、印度、中国的诗人或大哲学家都曾发出同样的论调,即歌颂赞美人类的伟大。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整个人类的文化史,却产生了不同的景象。当然其产生伴有许多历史条件,我们只指出几点,依照佛洛依德的看法,他认为人类从十七世纪起面临着三大打击:(1)天文学的打击,(2)生物学的打击,(3)心理学的打击,这三个打击使人觉得人类自身的渺小。<sup>[4]</sup>

从上述的这段话中,首先可以确定方东美对于人的存在是具有伟大价值的这一观点是持肯定之立场的,这也是他从中外先哲的资料中比较而得的一个论点。不过,此处也让人稍有疑问,因为如果分开来详细比较讨论的话,关于人类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以及人是否有其伟大价值等问题,在古希腊、印度等地还是有各种不同看法的。比如古希腊的奥菲斯教派(Orphic religion),认为人类的本性本来是由两种相反的成分构成怪异组合,即善良的灵魂是深深地陷在邪恶的躯体之内的。生命直如一场牢狱,而人只有接受惩罚,并期待他世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方可得到真正的生命之喜悦。这些理论也成为了希腊先天性恶论的源头,并影响产生了后来西方宗教上的性恶理论。印度的佛教哲学,也认为人本来就具备有烦恼的种子与清净的种子,生命乃是业习之集合。不过,从大体上看,它们虽然认为人性存在着某些缺憾,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在价值上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而且大多数认为人

是可以通过实际的行为来“忏悔罪业”或发扬人性光辉的一面的,所以大多数先哲还是选择站在人性的光明面,给予人类肯定的信心,这些在中国哲学中则表现得更加突出了。方东美的这一立场选择也表明了其文化思想之基本立足点。

不过,方东美看到,历史发展至近代以来,人的价值有渐趋渺小之趋势。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根据佛洛依德的观点进一步地指出,主要是因为有三大文化上的变动打击而造成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首先是来自天文学上的打击。方东美认为,以天文学的发展来说,自哥白尼时代以前,整个的天文学都是把地球当作为宇宙之中心。此亦即是说,人类生活在地球之上,理所当然亦即是宇宙的中心与主宰。但等到十七世纪的天文学发展以后,地球只被认为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颗小小的卫星,乃至整个的太阳系在宇宙的全体星系中亦如微尘一般,“是以人在广大的宇宙中,连个灰尘的地位都谈不上。”<sup>[5]</sup>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忽然骤降如此,岂能不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

其次是来自生物学上的打击。譬如在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总是以天地为父母,人生天地之间,顶天立地,参赞天地之化育,可说是天地之中心。而在早期希伯来宗教,乃至印度的婆罗门教中,至少也都以人是被上天所创造出来的,是从属宇宙最高精神主宰之形象,是一切万类之灵长,可以世代傲视于一切生物之上。而自从物种进化的观点兴起并流行之后,人是从动物的进化演变而来,“在人的社会里面,从图腾社会里面种种传说一直到许多神话,一直到近代生物学上科学的知识,都在证明这个人类在宇宙里面不是所谓的灵长”,<sup>[6]</sup>换言之,人类的祖先成为了禽兽,并无任何特殊性可言。方东美认为,这无疑也对人类以往的价值观念与地位感带来了一场巨大冲击。

再次是来自心理学上的打击。在过去的属于理性主义的心理学看来,人类拥有强大的意志,丰富的情感以及伟大的思想等,其中伟大的思想乃是由理性的超升而得来的。而演变至近代的科学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等之后,方东美认为,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平面心理学”。这种“平面心理学”把人的心灵放至解剖桌上逐个分析,使之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单元,然后又拼合在一起,结果导致生命的本质的直接流失。同时,方东美也指出了佛洛依德心理学的心理分析之方法也是有流弊的,它容易把人性分化成兽性,这样“人不是高贵的人而是低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各种怪模怪样都显

现出来了。”<sup>[7]</sup>

总结上述观点,不论是天文学、生物学亦或是心理学等,方东美眼中的近代以来人类思想文化之变动,其实都与一个主要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近代科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发展。正是由于科学理论与认识的种种变化,冲击了人类固有的思想文化认识,也改变了人类的一些传统观念与信仰。

而在当时的中国,国人对于真正的西方科学思想及历史演变并不太懂得,只是知道关注一些科学技术之成果。对此,方东美“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十七世纪以后的中国人,已经把中国有关科学技术的这一套历史的演变发展老早就忘掉了,这当然同中国的教育、及中国的科学制度有关,可以说已经埋葬了自己固有文化里面的本有优点。尤其是从明末以来,经过清代将近三百年,到民国以来迄今,我们可以说一讲到科学都是讲科学的‘尾巴主义’,不讲 scientific mentality(科学精神或心态)。只晓得人家经由高度的 scientific mentality 产生出来的结果,变成科技上面的成品。”<sup>[8]</sup>

他认为,当时人们的脑筋里根本就没有纯粹科学这一概念,所有的只是一些关于科技的知识,而这些只是属于应用科学的末流。反映在哲学上,便是仅注重罗素与杜威的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甚至以实证论来代表科学,对于整个西方学术的源头与发展并不能作全面地了解,乃至对于理性论乃至经验论,都无法从根本源头上讲起。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几乎被虚妄的科学主义等哲学思想所蒙蔽,甚至有一些较肤浅与低级的思想文化趁虚而入,形成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乱象,同时也影响了政治、经济、生活等的发展。

可以说,方东美的这一认识在文化上是极为深刻与富有预见性的。在现今的中国乃至世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文化思想上的这一乱象。而当今的科学技术之发展,正配合现代人不知节制地消费理念与物质追求,以更加迅猛的力量把人类引导向欲望的深渊。以往人文文化所构建的宁静和谐的精神文化生活早已势微至极。人们在盲目发展科技的同时,对于纯粹科学的精神及其目的似乎早已忘却,或者从未曾想过。从人类的精神文明上来看,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浩劫。

### 3

在方东美的文化演变观中,科学技术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乃是影响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变动的一个最重



要因素。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科学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缩小范围而具体地说,应该如何看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呢?

众所周知,在17世纪以前,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工尚不如现代一般明确,而当时的哲学还是处于总摄一切学科知识系统之崇高地位。等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各类学科知识的不断分化,科学也渐从哲学中分化而出,取得了较为专门而独立的地位。在近几个世纪中,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哲学之研究则显得有些“不温不火”,甚至出现过衰退之势,这也导致了一些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与对哲学的无端“藐视”之现象的发生。方东美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基于人们的四点认识:(1)科学是具体的,哲学是抽象的;(2)科学是进步的,哲学是板滞的;(3)科学是批评的,哲学是武断的;(4)科学是有实利的,哲学是不切人生的。<sup>[9]</sup>

为了让人更深入切实地了解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方东美对于这四点认识上的误解逐一做出了分析与反驳。

关于第一点,方东美认为,科学也不尽是具体的,而哲学也不全属于抽象的。说科学是具体的,是因为只看到了科学方法上的观察与实证等技术层面,这些故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而实证科学之进步首先从数学而来,数学的发明与哲学家是无法分开的,而数学的某些部分本身也是极为抽象的,它的对象并不是实验的事实。更进一步说,任何物质科学的推论中也都是可以找到某些抽象之步骤的。

关于第二点,方东美指出,科学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于它的不断进步;而哲学最易受人诟病的,也就是它的迂远性,各种争辩议论不断。不过,科学正是由于它的进步性,反而导致各学科都不断出现不确定的纷争;哲学的问题表面上看似循环辗转,而至今都不失其时效性,看起来似乎没有进步,但是它的进步与不同却是表现在过程之中的。

关于第三点,方东美反驳道,科学理论之背后常常设有一种潜在性之假定,这种假定往往是没有意义与根据的。而哲学对于科学之假定与结果,却是常常可以提出批评。因此不可说科学就是批评的,而哲学就是武断的。

关于第四点,方东美辩护道,真正确定的知识都是有实践性的,科学与哲学都是如此。科学的发明也不是有绝对的实利,如各种侵略武器之发明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哲学也并不是不能增进人类的享受,因为人类

除了物质性的享受以外,尚有精神上的幸福。

通过上述这四点的综合辩证与分析,我们便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种种关联与异同了。

科学需要正确的思想文化作为其导引与评定,思想文化在某些方面也需要科学来验证与实践,而进一步从根本上说,思想文化与科学最终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命的存在而提供参考与服务的。在未来人类科技与文明的态势中,我们的思想文化与科学发展应该如何“融合”起来而蕴育出一套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的文化系统?人类的生命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在未来的时代中得到安定与升华呢?方东美指出:新的发展都在指正这个宇宙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械的物质秩序。因为一切的转变都是指向生命的向上发展、心灵的向上发展,然后在这重重发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Emergence of Value(价值的涌现和呈露)。<sup>[10]</sup>

我们知道,在古典主义的科学思想中,至少还是坚持各种科学理论是要在于表达真理;而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来,由近代的科学唯物论发展出的各种科学实证论,则认为物质世界当中只有事实而已,只是根据这些事实而产生理论,只观察它能否与事实相符,而忽略其它比如其价值性的一面。如此一来,科学的真理性被渐渐转化为科学的有效性,渐至出现了所谓的“价值中立主义”。而对于人文文化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处理关于价值现象的问题,因此不可以用价值中立的态度来研究和建立人文文化的知识系统,否则人性将被化为物性,生命世界也必然会沦落于一种下堕的丑陋中。方东美认为,受近代科学唯物论的影响,人们只是把整个宇宙当成一个单一的物质领域;而从生命的角度而言,这个世界根本是立体而多层次的。“所以这个世界,显然不是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从有限到无穷的开放世界。”<sup>[11]</sup>物质世界只是人类生命的根据与起点,从物质世界向上尚有生命世界、心灵世界……直至最高的精神世界等的不同层次。生命的价值应该是以物质世界为基础,层层向上点化而升华,最终契入生命精神世界的至高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方东美把生命的最高领域安排在精神世界,但是他并没有忽略物质世界的基础性。他认为正是因为有物质世界这一“起点、根据与基础”,方可进一步“去弘扬生命的精神,根据物质的条件,去从事生命的活动,发现生命向上有更进一步的前途,在那个地方去追求更高的意义、更高的价值、更美的理

想。这样把建筑打好了一个基础,建立生命的据点,然后在那里发扬心灵的精神。”<sup>[12]</sup>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在人类生命的升华中发挥作用,前提是要搞清楚它在生命世界中的定位与目的,而并非被它所牵着走。

那么,生命在到达最高的精神领域之后,是否就意味着终点呢?方东美认为,到达最高的精神领域,还只是进行了生命“上行”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生命的“下行”。对此,他曾在宏观与共通性上分别以中国哲学中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来进行论证:

“儒家在精神文化、道德、艺术、哲学思想上面,可以把他的精神提到很高,高到一种程度,可以通透到达天,通极于天。但是儒家的思想,这么一个超越的精神,一定还要回过头来,贯注在现实世界上面,用儒家哲学上的一个专门名词叫做‘践行’,把一切高尚的文化理想,转移过来,在现实的人间世、现实的物质存在上面要能够兑现。”<sup>[13]</sup>

“原始的道家精神,可以采取‘反者,道之动’,一方面提升他的精神到达‘寥天一’的高处,那时他的哲学形而上学可以飞扬到达那么高的境界;……因此,道家有一种高尚的精神成就,从他那个高尚的精神成就的眼光,再回顾人间世,他不但不诅咒世界,不诅咒下层的世界,即使是下层世界也在他的精神上面变成‘人间天国’。”<sup>[14]</sup>

“就佛家而言,小乘佛教初起时,认为这个世界是黑暗、苦恼、罪恶;但是等到他自己精神修养一高了之后,再以下回向的方向来俯视现实的人性,不仅仅人有佛性,而且万物都有佛性。因此,在下回向的方面,当初他诅咒人间世为无常、黑暗、罪恶、烦恼、痛苦,现在他都取消了,他拿最高的慈悲心来拯救世界,把这个世界从黑暗、痛苦、烦恼中变成一个精神理想的领域。”<sup>[15]</sup>

综上所述,方东美所希冀建立的是一套有机的双向立体文化系统,在这样一套文化系统中,虽然存在不同的层次性,但一切都是互不妨碍而和谐共存的。生命层次的上级与下级之间双向交流,彼此之间并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是互为增进的。这一点也明显克服和超越了西方哲学思想中二分法式思维模式的桎梏,巧妙地解决了近代以来受科学思想影响的物质与生命之间的隔阂问题。同时,他也证明和强调了人类的生命应

该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的,科学的进步不应该降低人类的价值与阻碍生命的发展以及对形而上的追求。这也是他对近代以来受科学影响的价值中立主义与机械因果论的一种批判。

从方东美先生对近代文化演变的分析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于时代文化变乱的痛苦与无奈,也可以看到他对于人类生命价值之肯定与热爱。生活在近现代这样一个文化交变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方先生对于文化演变之见识的广博与深远,可谓同时代同类型人物中之佼佼者。诚然,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方东美的文化演变观是以他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做基础的,而他的生命哲学主要还是根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之基础上,并且深受了大乘佛教哲学之影响。总的来说,他的认识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并融合了对西方哲学与科学思想之批判,对于当前的文化发展,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方东美先生的哲学[C].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89.5.
- [2]方东美.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99-100.
- [3]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2.
- [4][5][7]方东美.教育与文化·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70,271,273.
- [6]方东美.当前世界思潮概要·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87.
- [8][10][11]方东美.华严宗哲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122,126,15.
- [9]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3-5.
- [12][13][14][15]方东美.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51-52,50,50-51,51.

责任编辑 刘宏兰